

# 中国新诗总系

## 史料卷

总主编 谢冕

本卷主编 刘福春



NLIC 2970719177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中国新诗总系

## 史料卷

总主编 谢冕

本卷主编 刘福春



NLIC 2970719177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诗总系. 第 10 卷, 史料. 1917 ~ 2000 / 谢冕主  
编; 刘福春分册主编.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7553-9

I. 中… II. ①谢… ②刘… III. 新诗 - 诗歌史 - 中国 -  
1917 ~ 2000 IV. I 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3230 号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 导言 艰难的建设

刘福春

二十世纪过去了，我们有幸能站在今天来面对已经逝去的上个世纪的新诗。在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里，新诗从诞生到成长经历了种种曲折，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新诗史料，但也使史料的收集、整理成为一个难题。本文作为《中国新诗总系·史料卷》的导言，拟就近一个世纪的新诗史料工作进行粗略的梳理，并对现状做出一些初步的分析。

## 耕耘与收获

如果追溯新诗史料最初的工作，或许要从一九二〇年一月由新诗社编辑部编辑、新诗社出版部在上海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谈起。这部我们现今见到的出版最早的新诗集也是新诗史料工作的第一个成果。首先是这部新诗集的编者有很明确的“因为要研究新诗”和“汇集几年来大家试验底成绩”<sup>①</sup>的编辑目的，其次是所收集的范围较广，并在每首诗后注明出处。所收一百零三首诗共录自二十余种报刊，这些报刊除《新青年》《新潮》等影响较大的之外，有不少像《新空气》《黑潮》《女界钟》等现今已很难见到。这些报刊上面所发表的诗作因这部诗集得到了保存，使得我们今天重新面对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较真实、完整地看到新诗最初的足迹，也由此可知当时对于新诗的提倡，并非仅仅是《新青年》等几个刊物孤立的运作。从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新青年》上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九首白话诗，到这部诗集出版才仅仅两年的时间，可见新诗史料收集整理工作起步还是比较早的。紧接着，同年八月许德邻编的《分类白话诗选》由崇文书局在上海出版，该书一名《新诗五百首》，实收诗作二百三十三首（组）。阿英认为：“此集为初期新诗之最完备的选集，各主要杂志，主要报纸上的著作，

---

① 见《新诗集》序《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

网罗靡遗。就资料言之，此集当为最佳。”<sup>①</sup>一九二一年三月胡怀琛编的《尝试集的批评与讨论》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该书收有胡怀琛《尝试集批评》、吴天放《评胡怀琛尝试集正谬》等当时讨论《尝试集》的文章和书信，是我国第一部新诗作品的评论集，保存了一批研究胡适的早期资料。一九二二年八月北社编的《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是最早的一本年度新诗选集，展示了新诗在一九一九年的成绩，也开了新诗年选之先河。

在这样短短的几年时间，新诗史料的收集就能有如此的成绩是应该庆幸的。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以上的编辑工作大多数并不是以收集史料为目的，只是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史料的作用，然而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从单纯的史料工作来讲，新诗书目的编撰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新诗书目的收集整理最初所见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一书中，该书第十章附录有《新文学创作书目一览》，其中有新诗集一百种。这之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出刊的《诗帆》第2卷第5—6号曾刊出《诗册编目》；一九三六年二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其中有朱自清编选的《诗集》和阿英编选的《史料索引》，《史料索引》在《卷五·创作总目》中收录有新诗集的书目，而且每本诗集都有细目。一九三七年一月《文学》第8卷第1号刊出新诗专号，这本厚达二百九十九页的带有总结性的专号除刊有茅盾《论初期白话诗》、穆木天《郭沫若的诗歌》、石灵《新月诗派》等诗论外，还刊出曲鸿、韩学勤、柳倩合辑的《新诗集编目》，编目共收录诗集四百余种，展示了此前新诗创作的成绩。除了新诗书目的编撰，还应提到的是刘半农一九三三年编印的《初期白话诗稿》<sup>②</sup>，该书影印了新诗初期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新诗手稿，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以上这些都显示了新诗史料工作的良好发展态势。

然而很快新诗史料工作就停顿下来，其原因是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这之后的战争不仅仅是停止了新诗史料的工作，更严重的是对新诗史料的直接毁坏，使得以后的工作难度大大增加。从抗

<sup>①</sup>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第296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2月。

<sup>②</sup> 该书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刊印。

战爆发到一九四九年，有关新诗史料的整理就所见只有孙望、常任侠编了《现代中国诗选》和孙望编了《战前中国新诗选》以及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sup>①</sup>此外，一九四四年九月出刊的《诗领土》第4号曾刊出萧雯的《征求资料小启》，小启讲：“最近想干一件很傻劲的事，就是编辑一部《中国新诗总目录》，把自胡适的《尝试集》以来各家刊印的诗集，作一详细的目录，虽则已经草就一个大纲，可还不知那一天可以完工，而且编好了有没有机会得以出版，那些且不管它，我知道这是件对于中国新诗有意义的工作，至少也是新诗爱好者的珍贵参考书；且做第一步事，就是着手搜罗调查征求各项资料，然后加以整理，可是这工作似乎不是个人的能力所能胜任，因此很希望《诗领土》的同人帮助我一同来进行，请先从自己藏书中所有的，及看到的知道的各种诗集及新诗刊物里将她们的：著译者，书名，出版时期，书局名称，印行数量，当时定价，页数（请以 Page 计算），开本，内容简述（如该书共载诗作若干首及附作，或译某国某人诗各若干等）以及其他种种，各项抄列表格，在这里一定会给我许多参考的资料。”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计划，可惜的是以后未能见到相关的成果和消息。

一九四九年后，新诗史料的工作应该有一个重新的开始，然而事实却并不乐观。在大陆，所能见到的不是很多，只有鲁深编了《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补遗》和臧克家编了《中国新诗选》（1919—1949）、魏巍编了《晋察冀诗抄》以及诗刊编辑部编了四集《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等，<sup>②</sup>而且这些工作从史料的角度来看问题还不少，如《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所收诗集都没有注明出版时间。从现有的资料看，有关新诗史料的工作并非无人去做。一九五〇年六月南京市诗歌工作者联谊会举行过一次诗歌展览会，共展出新诗

① 《现代中国诗选》南方印书馆 1943 年 7 月出版，《战前中国新诗选》绿洲出版社 1944 年 10 月出版，《闻一多全集》1948 年 8 月出版。

② 《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收入张静庐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 1957 年 5 月出版；《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补遗》收入张静庐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 1959 年 11 月出版；《中国新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 年 8 月出版；《晋察冀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 年 3 月出版；《新诗歌的发展问题》四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为：第一集 1959 年 1 月，第二集 1959 年 9 月，第三集 1959 年 12 月，第四集 1961 年 12 月。

书刊六百九十八册，成绩相当可观。<sup>①</sup>这次展览，曾编有一份目录，但后来并没有发表或出版。一九五七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组曾“根据本所图书室，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作家协会图书室，文学讲习所图书室，文化部图书室等处之卡片，并参考中国新文学史，中国出版史料，全国总书目及一些私人藏书编成”《中国新诗书目初稿(1920—1949)》，<sup>②</sup>也只是油印征求意见，未能正式出版。

那是一个不需要史料的时代，史料的选编也成了“以政治为标准”的选择。像前面提到的臧克家选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该书的编辑目的是“为了帮助青年读者丰富文学知识，了解‘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发展和成就的概况”，并“主要介绍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是中国新诗创作中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sup>③</sup>然而书中没有选入胡适的诗，也没有徐志摩的诗。<sup>④</sup>不重视史料，或无视史料，新诗史的研究便成了一种围绕着政治运动的随意的和不断更改的写作。像该诗选的代序《“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最初在论述艾青时这样写道：“在抗战初期收获较大，成绩最好的是艾青。他连续发表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诗，歌颂了中国士兵的英勇的大无畏精神，但不是概念化的或口号的而是通过了具体的人物形象的描写，在这具体描写里，沁透着诗人的真实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情感。”“艾青的诗，采取了‘自由诗’体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虽然在‘五四’时期就普遍的被应用着，但艾青的语言比‘五四’时期的新诗语言在艺术的成就上却高得多了。”<sup>⑤</sup>而这些论述到一九六二年却改成：“艾青在抗战以前写过《大堰河》。这个集子，表现了他反帝和同情农民的

- 
- ① 见陈山、孙望、赵瑞蕻《南京市第一届诗歌展览》，载1950年8月10日《文艺报》第2卷第10期。据该文介绍，此次展览陈列出来的诗刊书籍共计八百一十四册，除关于屈原研究和楚辞的一些书刊外，新诗书刊有六百九十八册，其中诗刊一百二十九册（包括报纸副刊的合订本），单行集子四百七十五册，理论三十册，译品六十四册。
- ② 《中国新诗书目初稿(1920—1949)》，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组1957年编印，引文见陈尚哲《几点说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组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 ③ 《关于编选工作的几点说明》，《中国新诗选》第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8月。
- ④ 此书1957年3月再版本补入徐志摩的《大帅（战歌之一）》和《再别康桥》诗二首，但仍没有选入胡适的诗。
- ⑤ 《中国新诗选》第25—26页。

思想情绪。抗战以后他接连出版了《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火把》等诗集。他以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求光明、歌颂抗战的热情，曾经在向往革命的青年读者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他利用自由体的形式，鼓吹‘诗的散文美’。他有他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受过法国象征派的影响，有的诗篇，流于晦涩。”<sup>①</sup>在那早晨还是优秀的诗人，晚上却成了万恶的“敌人”的变幻莫测的时代，这样的改写是司空见惯的。这种对新诗史的任意“改写”或“重写”，还有什么史料工作可言。更有甚者，在那个年代史料往往还会成为诗人的“罪证”。比如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就是胡风的一些书信；从此以后，为了免遭不测，多少诗人的书信和日记没有损在战火之中却不得不毁于诗人自己之手，新诗史料又一次遭到毁坏，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诗史料工作更是雪上加霜。

而在台湾新诗史料工作也并非顺利，一是原始资料缺乏，再是限制太多，“几乎所有来自大陆的东西都成为禁忌”，<sup>②</sup>很多大陆诗人的作品要改换署名才能出现在报刊上。比如一九七九年七月十日台北《联合报·联合副刊》刊出的“抗战诗选”，其中有一首杜运燮的诗《滇缅公路》，但作者却写成了“杜宇”。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远见的诗人还是开始了新诗史料的垦荒工作。一九六六年一月《创世纪》第23期开始刊出《新诗史料》专栏，痖弦先后在上面介绍了废名、朱湘、王独清、孙大雨、辛笛、绿原、李金发、康白情等诗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创世纪》第42期起又连续发表痖弦编的《民国以来出版新诗集总目初编》、《民国以来新诗总目初编》（诗刊部分）和《中国新诗年表（1894—1949）》。虽然这些资料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但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已实属不易。痖弦后来谈道：“当时我之所以从事这项工作，主要是觉得，由于战乱，使中国新文学的传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断层现象；”尤其是一九四八年以后，“三、四十年代作家的作品与资料极为稀少，年轻的一代，对那个时代的诗作几乎没有任何的认识，这对我们承继、发扬与创新文学传统的使命而言，并不是件有利的事。因此我以为有把自己多年的珍藏公诸同好的必要；”而对于大陆的作家，“也希望能藉这番钩沉的工作，彰显他们的文学业绩，并兼致我的怀念与同情。”<sup>③</sup>

---

① 《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第2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9月。

②③ 瘫弦《中国新诗研究·自序》，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1年1月。

七十年代末,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新诗史料工作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大陆可以说是出现了热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一九七八年,由杭州大学和苏州大学发起并串联其他院校开始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一九八一年起,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协作,丛书被列为国家资助的重点科研项目;一九七九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辑《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分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甲乙丙三种,也列为国家资助的重点科研项目。这两个大型项目中,均有很多诗人的研究资料专集,<sup>①</sup>这些专集的内容包括诗人生平、创作自述、研究文章选辑、资料索引等,是研究诗人的重要资料。《中国现

- 
- ①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中有:《贺敬之专集》(王宗法、张器友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艾青专集》(海涛、金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闻捷专集》(贾植芳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李瑛研究专集》(李浹、李一娟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田间研究专集》(唐文斌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徐迟研究专集》(王凤伯、孙露茜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2月)、《何其芳研究专集》(易明善、陆文璧、潘显一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3月)、《李季研究专集》(张器友、王宗法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4月)、《张志民研究专集》(李浹等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研究合集》(耿金声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等。《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有:《蒋光慈研究资料》(方铭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王统照研究资料》(冯光廉、刘增人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冰心研究资料》(范伯群编,北京出版社1984年12月)、《李广田研究资料》(李岫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刘半农研究资料》(鲍晶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刘大白研究资料》(萧斌如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闻一多研究资料》(许毓峰等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7月)、《俞平伯研究资料》(孙玉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郭沫若研究资料》(王训研究资料)(孙玉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周作人研究资料》(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李季研究资料》(赵明、王文金、李小为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徐志摩研究资料》(邵华强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柯仲平研究资料》(刘锦满、王琳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胡适研究资料》(陈金淦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臧克家研究资料》(冯光廉、刘增人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绿原研究资料》(张如法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冯文炳研究资料》(陈振国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8月)、《冯乃超研究资料》(李伟江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光未然研究资料》(刘可兴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等。

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还出版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和《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sup>①</sup>,前者里面有部分诗刊目录,后者其中有刘福春、徐丽松编的《新诗卷》。《新诗卷》收录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出版的新诗集、散文诗集、诗剧等,并录有每本诗集的详细篇目。除了以上这两个项目,一九七八年还创刊了专门刊登史料的刊物《新文学史料》,至二〇〇〇年底已出版八十九期,其中刊出了大量新诗史料。

一九八一年七月辛笛等著的诗选《九叶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八月绿原、牛汉编的诗选《白色花——二十人集》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带有流派色彩的诗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新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关社团、流派的资料书籍也不断编辑出版,大型一些的有钱谷融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丛书,其中都收有不少新诗社团、流派的资料和诗选。<sup>②</sup>此外,其他的新诗流派诗选及当代的各种新诗社团的诗选就更多。

那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年代,随着一个个错案的纠正,已经被改写的新诗史面临着又一次地改写,史料工作不能不提到日程上来,几经破坏的新诗史料开始重新建设。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组织全室力量编辑《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其中有《中国现代新诗选》十卷。那是一次大规模地“打捞”工作,在当时引起很多诗人的注意。到八十年代初选编完成,共选入四百多位诗人的两千余首诗作,遗憾的是完成后未能马上出书,一九九六年十月才由北岳文艺出版社题名《中国现代经典诗库》出版。为补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需要,上海书店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人民

---

①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②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关新诗社团的有:《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王训昭编,1986年12月)、《九叶之树长青——“九叶诗人”作品选》(王圣思编,1994年10月)、《一代诗风——中国诗歌会作品及评论选》(王训昭编,1996年3月)、《“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王圣思编,1996年10月)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丛书有《现代派诗选》(蓝棣之编,1986年5月)、《〈七月〉〈希望〉作品选》(吴子敏编,1986年7月)、《象征派诗选》(孙玉石编,1986年8月)、《新月派诗选》(蓝棣之编,1989年9月)、《九叶派诗选》(蓝棣之编,1992年2月)等。

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这两套丛书按原本影印或重排出版了几批现代文学史上早已绝版的书刊,其中有很多新诗史上珍贵的资料,像《尝试集》《分类白话诗选》《湖畔》《新月诗选》等。很多出版社还编辑出版了各类文学书系,如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中国新文艺大系》,重庆出版社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等,其中都有诗歌卷。此外,诗人的全集、文集的编辑和出版更是丰收,已出版的有《郭沫若全集》《何其芳文集》《臧克家文集》《朱自清全集》《艾青全集》《闻一多全集》《俞平伯全集》《胡风全集》《戴望舒全集》《冯至全集》《郭小川全集》等<sup>①</sup>。以上这些工作都从不同方面对新诗资料进行了发掘。

在台湾,新诗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九八四年十月台湾中央图书馆主办“现代诗三十年展览”,展有诗集、诗刊、诗人资料等,并编印了《现代诗三十年展览目录》。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出刊的《文讯》总第 56 期刊出“抢救现代诗”专栏,发表有张默《呼吁筹设“现代诗特藏室”》等文。一九九五年三月,由文讯杂志社主办的“台湾现代诗史研讨会”召开,其中专门举行一次“新诗史料问题”座谈。值得高兴的是,在台湾诗坛上活跃着一批新诗史料的辛勤耕耘者,而且都有不凡的成绩。除前面提到的痖弦外,张默更是一位热心者,他编的《台湾现代诗编目》一九九二年五月由尔雅出版社出版后深受诗人和新诗研究者、新诗爱好者喜爱,一九九六年一月又修订再版。这之后,张默还与张汉良主编有《创世纪四十年总目》<sup>②</sup>,一九九八年六月他的《梦从桦树上跌下来——诗坛钩沉笔记》又由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林焕彰一九七六年二月就编辑出版了《近三十年新诗书

---

①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起出版,《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1984 年出版,《臧克家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5—1994 年出版,《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1998 年出版,《艾青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1 年 7 月出版,《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 月出版,《俞平伯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出版,《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 月出版,《戴望舒全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 1 月出版,《冯至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出版,《郭小川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 月出版。

② 创世纪诗杂志社 1994 年 9 月出版。

目》<sup>①</sup>,后又编有《中国新诗集编目》一九八〇年六月由成文出版社出版。麦穗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新诗史料的考辨文章,一九九八年五月结集为《诗空的云烟——台湾新诗备忘录》由诗艺文出版社出版。秦贤次的史料工作不局限在新诗,然而在新诗史料收集方面做了很大贡献,他与王宏志合编的《诗人朱湘怀念集》一九九〇年六月由志文出版社出版。赖益成主要工作不在史料,然而他编辑出版的《葡萄园目录》<sup>②</sup>以其详实完备得到好评。此外,台湾的诗社也普遍重视新诗史料的整理工作,大多都编辑出版有诗社的诗选和诗刊的总目录,所见就有《笠诗刊三十年总目》<sup>③</sup>以及前面提到的《创世纪四十年总目》《葡萄园目录》等。还应提到的是,在香港,《香港文学》等刊物也刊登了不少新诗史料,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也附录有《收获期诗人诗集录》《战时战后诗人诗集录》<sup>④</sup>等。

### 存在的问题

二十世纪的新诗史料的工作所收获的成果是相当丰富的,以上所讲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没有提及,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新诗史料工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问题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还有大量的初步收集、整理工作没有做,二是已出版的成果中问题较多,三是对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开掘的工作还少有人问津。

第一个问题。在二十世纪,新诗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虽然投入了不少的人力和物力,进行了广泛地开垦,但仍有大量的空白需要填补。第一,作为新诗史料的基本建设还不完整,新诗出版物目录的编撰有很多空缺。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新诗集已经有了较详细的书目,但诗刊完整的目录还没有;一九四九年后出版的新诗书刊台湾出版了张默的《台湾现代诗编目》,而大陆和香港至二〇〇〇年还没有出版过这方面完整一些的编目;<sup>⑤</sup>在台湾《创世纪》诗杂志、《笠诗刊》、《葡萄园诗刊》

---

① 书评书目出版社出版。

② 诗艺文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出版。

③ 吴政上、陈鸿森编,笠诗刊社 1995 年 10 月出版。

④ 《收获期诗人诗集录》见《中国新文学史》中卷,昭明出版社 1978 年 11 月再版;  
《战时战后诗人诗集录》见《中国新文学史》下卷,昭明出版社 1978 年 12 月初版。

⑤ 本人编撰有包括当代新诗书刊在内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2006 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都出有总目录,可在大陆只见一九九七年一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书后附有《〈星星〉四十年总目》,而像《诗刊》这样影响大、出刊长的刊物总目录的编辑也还没有做,倒是日本学者岩佐昌暲主编了《诗刊(1957—1964)总目录·著译者名索引》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在日本的中国书店出版。除书刊外,还有大量的诗报和报纸上的诗副刊、诗专版及期刊诗专号都有待收集整理,如《北平晨报》上的《诗与批评》、《大公报》刊出的《诗歌特刊》等,这些新诗史上重要的诗副刊应该有较完整的编目。

第二,重要诗人和作品的研究资料还需要建设。虽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都出版了不少诗人的研究资料专集,但应该看到,这并不是新诗史的专门资料,而且所选入的作家也是依据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念选定的,再加上后期出版越来越困难等原因,像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穆旦这样一些在新诗史上有影响的诗人的资料或是没有列入丛书,或是列入没能出版。重要作品的研究资料专集出版的就更少,大陆所出版的未见到,台湾出版的见到的只有侯吉谅主编的《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关重要评论》和罗门编著的《〈麦坚利堡〉特辑》等几种。<sup>①</sup>还有诗人的年谱之类的这样研究诗人的重要资料也不够,作为专书已出版的有《郭沫若年谱》《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刘半农年谱》《闻一多年谱长编》《朱自清年谱》等,<sup>②</sup>很多诗人还缺乏详实的资料。重要诗人的作品辑佚、钩沉工作也需进一步努力,虽然这方面工作已做了不少,出版了《徐志摩诗集(全编)》《臧克家集外诗集》《何其芳佚诗三十首》《戴望舒诗全编》《穆旦诗全集》以及诗人的全集、文集等,<sup>③</sup>但从

---

① 《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关重要评论》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8 年 6 月出版,《〈麦坚利堡〉特辑》文史哲出版社 1995 年 4 月出版。

② 《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5 月出版;《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4 年 5 月出版;《刘半农年谱》徐瑞岳编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出版;《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7 月出版;《朱自清年谱》姜建、吴为公编,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5 月出版。

③ 《徐志摩诗集》顾永棣编,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年 7 月出版;《臧克家集外诗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4 月出版;《何其芳佚诗三十首》罗泗编,重庆出版社 1985 年 1 月出版;《戴望舒诗全编》梁仁编,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5 月出版;《穆旦诗全集》李方编,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年 9 月出版。

面和点上仍多有欠缺与遗漏。

第三,新诗社团、流派的资料也不充分。前面所讲到的这方面的资料以作品选居多,作为史料仍有不少有待收集整理,比如象征派、现代派等,都没有专门的资料出版。而且所注重的也多为一九四九年前的社团、流派,像湖畔诗社、中国诗歌会等;一九四九年后出现的如台湾的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大陆的“白洋淀诗歌群落”“非非”“他们”等,则注意得不够,所见只有《朦胧诗论争集》《沉沦的圣殿——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等几种。<sup>①</sup>还有一些特殊时期的新诗资料,像“反右”“文革”等。对这些时期诗歌应该进行搜集和整理了,特别是“文革”时期的诗歌。“文革”诗歌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也是前十七年诗歌发展到极端的一种形态;这一时期的写作大部分远离了诗歌,但也有一部分写作又重建了诗歌的尊严。它是结束,也是开始,是新诗发展的一个非常时期。虽然时间离现在并不算远,可资料收集也不容易。

第四,在时间上是重现代轻当代。这一点前面也谈到了,不过还想专门提一下。从整个新诗史料建设的情况来看,似乎是时间越远的越清楚,越近的反而越模糊。举一个例子,“朦胧诗”离今天并不算远,但其中究竟应包括哪些主要诗人一时还不易说清楚。芒克无疑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一九七八年他与北岛共同创办了朦胧诗最重要的刊物《今天》,并在上面发表大量优秀诗作。但是在所见的《朦胧诗选》中,最早的一本辽宁大学中文系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朦胧诗选》,舒婷选了二十九首,北岛选了十五首,而芒克只选了一首;最流行的一本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朦胧诗选》,北岛是二十七首,舒婷二十九首,芒克是三首。有趣的是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朦胧诗一辑中没有芒克的诗作,而在新生代诗一辑中却选了一首。当然说起来这也属正常现象,史料工作本来就需要时间和积累,不过这些是否也说明当代新诗研究的史料意识还有待加强。我们不能只顾过去,虽然对过去欠得实在是太多。新诗史

---

<sup>①</sup> 周伦佑编有《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小海、杨克编有《他们——〈他们〉十年诗歌选》(漓江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都只是作品选。《朦胧诗论争集》,姚家华编,学苑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沉沦的圣殿》,张明策划、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

料工作应该改变“今天清理昨天的债，明天又偿还今天的债”这种非良性循环，在进行历史的追踪同时，也要与当前保持同步的建设，不能总是亡羊补牢，失去了才认识到其重要。事实告诉我们，失去的很多是后来怎样努力也找不回来的。还有从我个人的经验看，虽然新诗史料现代部分损失较大，可当代部分收集更加困难，主要是数量太大，资料太庞杂。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各种渠道出版的新诗集、诗刊、诗报等，很多图书馆都不收藏，还有地分大陆、台湾、香港多处，查找实在不易。

第五，诗人创作文本之外的资料收集和整理还不够，像诗人的日记、书信等出版得太少。这些资料收集整理的难度比较大，一是损失严重，经过多次运动，不是被抄走就是被销毁；二是因为多种原因还不愿意公开或还不能公开；三是涉及大量的人和事，整理起来难度很大。《新文学史料》陆续刊出了不少，已出版的诗人全集和作品集也收入了一些，但仍需进一步整理。诗人的日记、书信等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像《郭小川全集》所收的日记、笔记和书信，为研究诗人和诗史提供了其他文本不可能提供的丰富而真实的资料，出版后产生很大反响；牛汉的《命运的档案》<sup>①</sup>里所收的给胡风的信，其中有五十年代初对一些诗人的批评，保留了那个时代不能公开发出的声音。

再谈第二个问题。检视已出版的成果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还是较多的。第一是所用多为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很少能从原始资料开始，像鲁深的《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就是“参照《文学》七卷一期《新诗专号》柳倩、韩学勤、曲鸿等所辑之《新诗集编目》（该目录截止一九三六年六月）及其他书志并佐以个人藏书增补删节而成”。<sup>②</sup>这样一来往往是后者抄前者，前者一错后者跟着错，而且是越抄越错。比如王樵生的诗集《桃花底命运》，曲鸿、韩学勤、柳倩合辑的《新诗集编目》误为《桃花命运》，作者也误为王焦生，鲁深编的《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林焕彰编的《中国新诗集编目》和司马长风的《收获期诗人诗集录》也都是王焦生《桃花命运》；叶菲洛的诗集《昨日之花》，《新诗集编目》误为《昨日之衣》，《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中国新诗集编目》和《收获期诗人诗集录》又都是《昨日之衣》；南星的诗集《石像辞》，《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误为《石像群》，《中国新诗集编目》也是《石像群》；而臧克家的诗集《生命的秋天》《生命的零度》到

---

① 武汉出版社 2000 年 3 月出版。

② 见《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说明。

《中国新诗集编目》已变成《生》《生命的零度》《生命的叫喊》《生命的秋天》四本。这些看上去只是个别文字上的谬误，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是错不得的——即使只错一两个字，其史料价值就大打折扣，失去其价值，甚至只能起误导的作用。当然讲起来史料工作也应该借鉴前人的成果，不能总是从零开始，而且原始资料查找起来困难实在是太大，有些也无法查到，但是要看到新诗史料的工作一直很不完善，很多工作不能不从头开始。

第二是文字错误太多。像本人与杨匡汉编的《中国现代诗论》应该是使用率较高的一本书，一九八五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到一九九一年已印刷过三次，前些时候校读了其中几篇，发现错误很多。如徐志摩的《诗刊弁言》《诗刊放假》署名应为“志摩”，可写成了“徐志摩”，<sup>①</sup>这不能说全错，至少是不准确。在《诗刊放假》一文中有一句很明显是不通的话：“但本刊既然暂行结束，我们正不妨为开篇是我唱的，这尾声（他们说）也得我来。”查原文才发现原来是“但本刊既然暂行结束，我们正不妨回头看看：究竟我们做了点儿什么？因为开篇是我唱的，这尾声（他们说）也得我来。”丢了一大段文字，这无疑是没能仔细校对造成的，其原因可能有多种，可没有按学术规范去下功夫认真操做不能不是主要病根。类似的错误其他的书中也存在，致使这些本应是给研究者带来方便的资料书籍，在使用时又不能不留几分小心。

第三是全集不全。一是资料散失，很难收集全，二是多种原因有些作品不能收入，三是即便收入也做大量删改。第一点不用多加说明，仅就第二点和第三点举两个例子。艾青五十年代写过《什么“芽子”！》和《把奸细消灭干净》，这两首诗曾选入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八月出版的《把奸细消灭干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讽刺诗选》，但一九九一年七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艾青全集》没有收入，其原因并不是没有发现而漏收，一九八二年六月出版的《艾青专集》中的《艾青著译目录索引》就有这两首诗，之所以没有收入一定有其他原因。此种情况其他全集中也有一些。还有的是即便收入也做了大量删改，比如冯至一九五八年写有《论艾青的诗》一文，最初收入《诗与遗产》一书由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一月出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冯至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诗与遗产》编入全集第六卷。编者说明讲：“在《诗与

---

<sup>①</sup> 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徐志摩全集》关于《诗刊弁言》的题注也误为“署名徐志摩”。

遗产》一书中，个别篇章在写作时曾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作者事后曾为此深感歉疚，但为了尊重历史的原貌，本卷仍照原样予以收录，只是对有关当时被错误定性的人和事的提法在文字上作了少许处理。”可将《论艾青的诗》一文与《诗与遗产》原书上的相对照，全集中所删文字有三千字左右，删掉一百字以上的就有八处，最多一处删去一千多字。全集不全，这已是出版的多种全集的一个通病，一九四九年前去世的诗人还算好，以后去世的和还健在的诗人这方面的问题就多一些。经过多次运动，很多诗人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写了后来“深感歉疚”的文字，无视或简单地对待都是不应该的。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新诗史料还需要进一步整理与开掘。第一，版本的校勘。在新诗史上，诗人的作品常常是先在报刊上发表，再编入集子，又编入选集和全集，每次编入由于艺术和思想的变化或适应各种运动的需要等原因，有些诗人要对作品做一些修改或对篇目进行增删，而且每次必经编辑之手有些也会删改，由此造成了新诗史上多种版本的复杂现象。像郭沫若的《匪徒颂》一诗，一九二一年收入《女神》初版本其中有一节是：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庶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底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底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一九二八年编入《沫若诗集》时前三行改为：

发现阶级斗争的谬论，穷而无赖的马克思呀！  
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尔斯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

前后改动很大。还有冯至的《十四行集》，这是诗人的重要诗集，也是新诗史上最优秀的作品，诗集问世后一直受到肯定。可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冯至诗文选集》出版，十四行诗不但一首未选，诗人还在该书序中称这些诗“受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影响很深，内容与形式都矫揉造作”；而到了一九八〇年八月《冯至诗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四行集》的二十七首诗又全部选入了这本选集。经编辑之手删改的有